

建党记忆的影像叙事与政治认同建构*

——以《觉醒年代》为例

左路平^{1,2} 朱 亮²

(1.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2.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如何通过影像叙事激活建党记忆、强化政治认同, 已成为红色文化传播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课题。建党百年之际, 电视剧《觉醒年代》通过历史的还原重塑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过程, 为人们激活、复现和刻写了建党记忆, 在事实记忆重现建党过程、人物记忆呈现建党逻辑、情感记忆刻画情感连接和价值记忆诠释伟大建党精神等四个维度全景式复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逻辑与精神内核, 为建党记忆的影像化传承提供了典范。从政治功能来看, 《觉醒年代》在激活、重构和刻写建党记忆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政治认同功能, 事实记忆可以促进政治合法性认同, 人物记忆能够促进政党认同, 情感记忆促进政治身份与国族归属的情感认同, 价值记忆实现政治价值认同的功能。《觉醒年代》的影像叙事和记忆建构, 为同类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兼顾建党记忆影像叙事中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的统一; 注重通过群像叙事拓展建党记忆的叙事视角与记忆空间; 善于借助细节刻画与情感塑造构建立体化、具象化的人物形象, 并灵活运用影像修辞引发受众情感共鸣以塑造建党记忆。未来, 应当进一步发挥影像叙事的作用, 在其对记忆激活和刻写中实现其政治认同功能, 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政治保障和凝聚强大合力。

[关键词]建党记忆 影像叙事 政治认同 《觉醒年代》 情感认同

[中图分类号] G641; G122; J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 (2026) 04-0005-1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政治事件, 它在历史演变和实践发展中成为中国人民共享的集体记忆。作为拥有强烈政治属性的集体记忆, 建党记忆承载着建党的历史事实、理想信念、优秀特质和价值追求, 是当代中国人民宝贵的记忆财富。当前, 如何通过有效的方式建构和传承百年之前的

建党记忆及其承载的伟大建党精神, 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 成为重大时代课题。学界对此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杨婷对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的红色记忆机制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通过红色记忆的唤醒、诠释、复现和赓续四个角度的实践路径。^[1]陶俊怡认为红色记忆通过“符号凝缩—情节叙事—身体刻写”的运行机理作

收稿日期: 2025-07-20; 修回日期: 2025-09-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伟大建党精神的记忆叙事及其意识形态功能研究”(23CDJ008); 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项目“红色记忆的影像叙事及其意识形态功能”(2023CX011)

作者简介: 左路平,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安徽省江淮文化名家青年英才, 主要从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朱亮,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用于伟大建党精神的初始唤醒、故事构境以及价值内化,需要在高度重视红色记忆的塑造、丰富红色记忆载体、运用数字技术赋能红色记忆传播中通过强化红色记忆中传承赓续伟大建党精神。^[2]武豹和吴学琴指出了建党记忆在连贯映现建党历史、解析辨异多元文化和整合凝聚价值共识上的重要意义,并分析了历史虚无主义消解建党记忆的危害及其应对策略。^[3]赵爱霞和左路平在分析建党记忆的内容构成和记忆载体的基础上,指出了在建党记忆的唤醒、重构和刻写的过程中都存在着政治认同的功能诉求。^[4]在综合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认为影像作为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能够通过视听刺激的结合来呈现和表达事物以促进受众的视听体验,进而强化传播效能和记忆效果,这对于激活建党记忆、促进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播都具有显著的效果。《觉醒年代》作为建党历史题材影视剧中的代表性作品,受到观众的广泛欢迎。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觉醒年代》的分析,厘清建党记忆的影像叙事与政治认同建构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建党记忆的研究和其政治认同功能的实现。

一、《觉醒年代》对建党记忆的全景式呈现

中国共产党建党作为百年之前的历史事件,对于当代人来说已不存在亲身经历的可能,因而关于建党的历史认知只能借助集体记忆的载体来进行纪念和回忆。作为一种认知记忆,建党记忆可以借助多重记忆载体得以激活并实现记忆共享。实际上,每一种记忆方式都存在其局限性,要实现对建党记忆的时代激活、共享和刻写,就必须采取多种方式。而影像叙事就是记忆的重要载体,以建党历史为题材的影视剧不但是文艺作品,更是叙述革命历史、传承民族记忆的动态史书,承担着延续和传播建党记忆的时代任务。文化记忆分为功能记忆与存储记忆。《觉醒年代》作为影像叙事

的代表,其叙事逻辑正在于以存储记忆的准确性为基底,通过艺术创作激活功能记忆的认同价值。具体来说,《觉醒年代》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史过程,为观众刻写了建党记忆。同时,借助电视剧的视听叙事和历史叙事等,也可以回忆建党历史、体验建党过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进而在脑海深处刻写建党记忆,通过事实记忆、人物记忆、情感记忆和价值记忆等多重载体来记住建党历史。

(一)事实记忆:时代还原重现建党过程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觉醒年代》固然不可能像历史文献那样严谨求实,但也不能忽视它所承担的述说民族历史、建构历史记忆、增进政治认同的重要功能。因为影视作品“对历史的回顾与描写,对社会记忆的储存和恢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年轻一代接受、喜欢甚至追捧某部影片时,他们不把影片中对历史的回顾与描写当作影片故事叙述的一种方法,而是把它们当作一种文献资料或者历史证据加以认识”^{[5](P65)}。可见,影像叙事对于历史记忆的激活、建构和重塑都具有重要作用。《觉醒年代》就是在历史事实还原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艺术的加工,进而为观众营造出虚拟的在场感,激活了大众心中碎片化的历史。

从事实记忆维度来看,《觉醒年代》对历史进行了高度还原和影像复现。一方面,《觉醒年代》精准细致地还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从时间线上看,《觉醒年代》锚定从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独特的历史时期。将这一期间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一一呈现并精确地镶嵌在剧情之中,勾连起完整连贯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觉醒年代》也对历史场景进行了真实复现,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这些史实性的还原,为观众构建了一个沉浸式了解建党背景的“记忆之场”,使建党记忆有了坚实可感的情境支撑。

从影像叙事的艺术创作维度来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觉醒年代》也对历史记忆

进行了艺术性的还原与表达,从而将人们印象中平面化、碎片化的历史记忆补缀为立体化的场景,以艺术创作唤醒和激活了建党记忆。一方面,《觉醒年代》对历史记忆的艺术性还原体现在历史场景的艺术性表达上。如《觉醒年代》中对鲁迅写作中国首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艺术再现,《狂人日记》的重要意义与内容都已被公众熟知,但当电视剧塑造出这一史诗性的画面,就给观众原本限于书本中的记忆填补上视听空间的记忆血肉,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另一方面,《觉醒年代》对历史记忆的艺术性还原还体现在对早已成为人们认知记忆的小说情节的复现上。如鲁迅出场之地正是热闹的菜市口刑场,看客们麻木不仁地围观,行刑后抢着用馒头蘸血,这一场景正是对鲁迅《药》《阿Q正传》等小说情节的生动还原。而鲁迅则不为所动,继续与钱玄同交谈,对话中提及蔡元培,这也在《呐喊·自序》中记载详细。《觉醒年代》通过对历史场景与文学情节虚实交融的艺术还原,唤醒了观众深藏脑海的记忆,也使观众认识到时代越发黑暗,“觉醒”就越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从而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如剧中旁白所说,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进一步促进建党记忆的激活和建构,也同时发挥其政治认同功能。

(二) 人物记忆: 群像叙事呈现建党逻辑

“人物”是影视作品最重要的叙事载体,人物的塑造是影视作品创作的重中之重,也是观众评判一部作品是否合格的关键因素。传统的主旋律影视剧常常聚焦于单一主角展开叙事,并围绕其个人经历延伸出整个故事,这使得观众往往只记住了人物个体的心理和行为,而缺乏对历史时代的整体记忆与总体认知。《觉醒年代》则跳出这一固定框架,在宏观视角的基础上围绕百年前的不同人群进行表达,塑造出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陈延年、陈乔年、毛泽东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和以葛树贵为代表的劳苦大众这三类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求索而最终觉醒的过程,从而更全面地诠释

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逻辑。

首先,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知识分子的人物记忆。在建党早期,陈独秀以《新青年》杂志为号角,大力倡导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旧礼教、旧文化,试图从思想根源上唤醒沉睡的国民。李大钊则深入研究并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革命引入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他们思想觉醒与转变的过程,深刻地反映出当时中国对于先进思想的迫切需求,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思想启蒙层面的逻辑必然性。

其次,以陈延年、陈乔年、毛泽东等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群体的人物记忆。他们满怀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理想信念的炽烈追求,通过组织各类进步社团,以讨论、演讲、罢课等形式,广泛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在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冲锋在前,积极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中。青年学生群体的觉醒与行动,不仅展现了他们个人的成长与转变,也反映出整个社会在新旧交替中的动荡和变革。为人们呈现了建党历史的整体面貌,叙述了青年群体在中国共产党建党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进而为建党记忆注入了情感要素。

最后,以葛树贵为代表的劳苦民众的人物记忆。他们深受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处于社会最底层,却并未因此麻木不仁。葛树贵拉起跪地求助的妻子说:“穷人不是跪着的命!”而自己却抱头蹲在一旁,其抗争命运不公却又无路可寻的挣扎痛苦被生动地展现。在知识分子的宣传发动下,无数个“葛树贵”逐渐觉醒了阶级意识,认识到自身的强大力量与历史使命,这也是葛树贵后来成长为罢工运动中工人领袖的深刻原因。劳苦大众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和力量源泉,使中国共产党成立成为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

(三) 情感记忆: 人物细节刻画中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连接

《觉醒年代》对建党记忆全景式的展现,不仅体现在宏大主题的影像叙事中,而且体现在人物塑造中的细节上,使得历史人物摆脱符

号化、概念化的形象,回到鲜活生活之中。这种将宏大历史融入个体细节的刻画,以对个体人物情感状态描绘的微观叙事,非但没有减弱历史的厚重感,反而加深了家国大义的说服力。实际上,正是“以文化精神为主的‘软历史’描述削弱了‘硬历史’的说教感”^[6],从而加深了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并以建党情感记忆的方式延续至当下。

《觉醒年代》中的情感塑造首先体现在家庭情感的表达上。《觉醒年代》中的人物展现出丰富且动人的家庭情感画卷,有力地加深了观众对历史人物的记忆,并且这种情感会在共情的作用下以情感记忆的方式得以延续和转化,如剧中重点刻画的陈独秀的情感历程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感记忆。陈延年、陈乔年在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中逐渐理解父亲、敬重父亲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追求。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之间的情感关系错综复杂,深刻地反映出家庭情感与革命理想之间的张力,为观众激活、建构和刻写了深刻的情感记忆,无论是家庭亲情、革命热情,还是对于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都形成了丰富而复杂的情感记忆系统,这种情感也被延续到当下,在合肥修建的纪念革命先烈的延乔路成为人们情感释放和情感表达的“记忆之场”。

其次,《觉醒年代》通过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刻画,生动地呈现出当时社会多元的情感风貌,并在情感记忆的建构中促进情感的历史延续和时代转化。可以说,情感是人们对事物所具有的共同的稳定、深刻、持久的体验与感受,是集体记忆建构的最高层次。《觉醒年代》通过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刻画,生动地呈现出当时社会多元的情感风貌,并在情感记忆的建构中促进情感的历史延续和时代转化。具体而言,剧中多次出现李大钊深入工人群众的活动场景,正是对被压迫阶级的同情转化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努力为工人阶级谋求解放之路,为建党记忆注入了情感要素。再如青年毛泽东出场时在

雨中抱着《新青年》奔跑,眉头微皱间民生疾苦尽收眼底,他对民众的热爱之情,对统治者的愤恨之怒,都成为建党情感记忆体系的一部分。总体上看,《觉醒年代》中的不同群体尽管身份各异,但在民族危亡面前,他们内心的爱国情感、变革社会的美好情感期待则高度一致。建党记忆融入了广泛的群众情感因素,使得建党记忆不仅是作为历史事件而存在,而且作为全体民众在共同情感驱动下的集体选择,凭其情感内核而更具有可回忆性和共享性。

(四) 价值记忆: 影像修辞诠释伟大建党精神

象征是一种常见的文学修辞方法,也是一种重要的影像修辞方法。所谓象征,就是把抽象的思想感情用特定的事物表现出来,使之形象化,从而使艺术作品所要表达的意义空间和价值内核更加含蓄、深刻,“使观众增加了思考和想象的空间”^{[7](P3)}。《觉醒年代》中大量采用了象征手法,以各种具象化的镜头语言隐喻伟大建党精神,深刻地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加深了观众对建党历史的价值记忆。

首先,物象隐喻就是以具体事物隐喻人的情感、行为或状态,常见的物象隐喻是以动物喻人。如剧中李大钊决定冒险散发传单时,发现一只蚂蚁沿着手掌爬到手臂上。此时镜头不断推近,只见蚂蚁在手臂上的“丛林”中艰难寻路,这是对求索真理者的礼赞。此外,骆驼、白鸽、鸡、猴、兔等动物在剧中均有隐喻含义,这些隐喻不仅增强了剧情的深度,也使观众在审美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诗意,这些隐喻也转化为价值符号,预示着共产党人对真理、对理想的价值追求,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大无畏精神,这些价值符号也在历史的发展中成为价值记忆,不断被后人回忆和追溯。

其次,《觉醒年代》中大量运用蒙太奇手法,通过不同镜头的对列配置,引发观众的视觉联想,从而衍生出象征性的意义。如毛泽东出场时冒雨前行的场景,不仅象征着革命道路的崎岖艰难,也暗示了毛泽东将是那个最终领导

革命走向胜利的领导者。此外,陈、李准备发传单时,舞台上正在上演戏曲《挑滑车》,高宠凭一己之力连挑金兵的铁滑车,最终力战而亡。这一镜头既表现了他们如英雄高宠一样抗争,也与李大钊的命运形成“互文”,预示了他将来英勇牺牲的结局。同时,这种表现手法也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追求、理想信念、崇高信仰等内容以联想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加强价值记忆在影像中的刻写效果。

再次,色彩在《觉醒年代》中起到了烘托氛围与延展空间的重要作用。黑白两色的版画这一艺术形式在剧中的大胆采用,既扩展了叙事空间,也凸显了剧中人物的革命品格和斗争精神。剧中整体偏冷色调的画面,展现出旧中国积贫积弱、人民生活困苦的状态,为观众体会建党的艰难性与紧迫性提供了直观的视觉感受空间。而当描绘新思想传播、革命运动兴起时,画面中偶尔出现的暖色调元素,在冷色调的背景下格外醒目,不仅烘托出革命的热情与希望,也在色彩的对比与延展中,将观众的思绪从黑暗的现实空间带向光明的理想空间,使观众对建党历史的价值记忆从苦难走向希望、从困境走向胜利,在色彩的交织中得到丰富与升华,价值记忆也在这个过程得以共享和延续。

二、建党记忆影像叙事中的政治认同功能

作为建党记忆的影像载体,《觉醒年代》对建党记忆进行了全景式的呈现,其对建党记忆的影像叙事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在观众的一次次观看中逐渐建构起公众对于建党历史的集体记忆,形成共同的认同基础。影视作品作为承载意识形态传播功效的直观艺术形式,能够生动且形象地发挥其政治教育的功能,从而赢得广泛的政治认同。^[8]由于政治认同的本质是“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这属于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

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9](P6)}。《觉醒年代》通过对建党记忆的激活与重构,推动观众在理性认知和情感共鸣的交叉作用中实现价值内化,进而完成政治认同的分层建构。

(一) 事实记忆促进政治合法性认同

意识形态最主要的政治功能就是为统治秩序提供一种合法性辩护,唤起被统治者对既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信仰。^[10]意识形态本身就蕴含着为政党行为和国家行动提供合理合情合法解释和论证而维护政治合法性,促进政治认同的功能。从政治认同功能来看,对事实记忆的影像叙事和呈现,可以促进政治合法性认同,影像能够将历史场景真实还原,为公众搭建起感知历史的直接桥梁。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和表达,影像可以促进民众对历史的真实认知,进而从政治认知的层面对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和规律进行总结,得出关于历史的正确认知和科学评价,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历史规律的使然,从而促进政治合法性认同。简言之,历史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据,将建党的史实记忆呈现给观众,强化观众对历史的真实记忆,在记忆共享中促进政治合法性认同。具体来看,一方面,事实记忆的影像化呈现有助于拓宽政治合法性来源。《觉醒年代》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描绘,既清晰地展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黑暗与混乱,也全方位呈现了当时民众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进行的不懈斗争,从而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必然性,揭示了早期共产党人在各种救国方案的对比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艰难历程。相较于以往建党献礼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这一历史结果的强调,《觉醒年代》则将叙事视角聚焦在“中国共产党为何诞生”的历史过程,通过对无政府主义等救国方案破产的还原,《觉醒年代》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必然结合进行了过程论证。观众在了解这一历

史过程后,能对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对旧中国社会困境的积极回应、为什么是解决民族危机的希望所在这一结论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增添了坚实的历史依据,拓宽了其基于历史发展逻辑的合法性来源,使党的政治合法性获得了更具说服力的历史支撑。另一方面,事实记忆的影像化呈现有助于提升政治合法性水平。《觉醒年代》还原了中国共产党在众多思潮碰撞中,因顺应历史潮流、符合人民利益需求而逐渐成为革命领导力量的过程,既规避了过去将党史人物与人民群众割裂开的英雄叙事偏向,又以历史事实印证了党是人民的选择这一核心命题。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对历史事实的认知更加准确深入,也进一步理解中国现行国家制度的历史渊源与合理性,从而增强对现有政治体制的认同和信任,并升华为对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认同,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根本上提升了政治合法性水平。

(二) 人物记忆促进政党认同

编剧龙平平谈到创作《觉醒年代》的初衷是“说明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是哪些人搞起来的?”“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当初的选择对不对?”^[11]从政治认同功能来看,《觉醒年代》对于建党人物记忆的激活、建构和刻写,可以促进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政党认同是指“政治主体在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12],而民众对一个政党认同的形成与巩固,同民众对该政党的代表性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的认知深度具有重要关联。因此,《觉醒年代》对建党早期人物的故事叙事和艺术化表达,既让人们加深了对建党早期代表人物的记忆,从认知层面了解了他们的历史贡献和建党活动,也丰富和充实了党的形象。作为党的形象的具体代表,早期革命先烈的英雄形象在记忆刻写中深入人心,他们的情感、精神和信仰追求,

都塑造了党的伟大形象,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民众的政党认同,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认知、情感信赖和政治认同都伴随着人物记忆的激活、共享而得以强化和提升。具体来看,一方面,作为党的早期领袖,《觉醒年代》对最初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思想转变的逻辑理路进行了再现,也叙述了他们深入工人生活实际,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组织工人运动反抗压迫剥削的革命活动,展示了党早期革命活动的实践性。陈独秀原本坚称“二十年不谈政治”,但在意识到思想的解放根本无法与政治运动彻底脱离后,他不仅谈论政治,更是直接参与政治运动,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青年学生是党早期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和未来希望,《觉醒年代》对陈延年、陈乔年思想转变的展现实际是党对青年强大吸引力的体现,受吴稚晖影响,两人原本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理念能够实现社会的公平与自由。在赴法勤工俭学的过程中,兄弟二人通过亲身经历和对社会现实的观察,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局限性和空想性,进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最终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觉醒年代》通过对不同人物思想转变与价值抉择的细腻刻画,既从根源上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使观众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摆脱困境;也生动地展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进而使观众从内心深处认同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深刻领悟到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与坚定捍卫者,进而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 情感记忆促进政治身份的情感认同

一定程度上来说,政治认同的本质体现为个体对自身政治身份的确认,具体而言,即对现代民族国家成员身份的认同。国家认同是指“民众对国家基本制度的认同、对发展道路的认可,形成共属一体的文化心理现象,以及建构

起超越于各个民族的共同的民族观念”^[13]。国家认同的另一面就是民族认同,即国族认同,对中国人民来说,就是对自身中华民族的民族身份的认同。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认同就是中华民族中的成员对自己中华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归附。^[14]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对于自身所属民族的认知和确认构成民族认同的核心。从这个角度看,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首先是情感认同,即对国族身份的认同,尔后才是政治认同,也即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具有高度契合性,“借助文化记忆,一个集体的成员建立并培养共同的身份和归属感”^[15]。作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不断延续的文化记忆,在建党记忆的共享和回忆中,集体成员就“我们是谁”“我们应当记住什么”等问题达成共识,在相应仪式中获得身份归属感和认同感,而且就一些关乎共同体命运的重大问题形成共识、达成一致意见并采取共同的行动。作为具有深刻历史内涵与时代意义的影视剧,《觉醒年代》对建党记忆的影像叙事成为塑造公众认知和情感的重要媒介,对早期建党过程中人物情感的刻画和影像表达,不仅让受众在共享建党记忆的过程中,有着丰富的情感体验,更在情感共鸣与情感代入的双重作用下,与历史人物的情感形成深度联结,产生情感层面的共振。这种情感体验也成为受众脑海深处的情感记忆,对受众产生持续影响,使观众深刻体会到国族身份所承载的责任与意义,进而将个人身份认同融入国家整体之中。与此同时,这种情感体验和情感共鸣也会产生迁移,即对电视剧中人物的情感共鸣,会迁移和转化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感认同,也即对政治价值的认同。因为根本上,这些情感体验都是围绕建党历史而产生的,也是围绕建党核心人物而共享的,这种情感也必然会被导向中国共产党,成为政治情感认同的重要记忆资源和支撑。

(四) 价值记忆促进政治价值认同

有学者指出,“革命历史本身就是一种高

能量的意识形态能指,电视剧则是受到特定文化权力以及意识形态调配、征召的文化场域,两者结合而产生的革命题材影视剧不应回避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讨论”^[16]。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大多忽略了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合理性这一问题的讨论,而是直接呈现这一历史结果,这既消解了革命先烈坚定信仰所带来的心灵震撼,也削弱了对党的这一历史时期政治价值的认同。究其本质而言,价值认同是个人认同、群体认同、社会认同的辩证统一,具有经验、情感、理性三个层次。^[17]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话语,伟大建党精神本身传递的就是一种价值信仰和价值追求,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内核,具有广泛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因此,《觉醒年代》通过对建党价值记忆的隐喻化表达、象征化呈现和符号化凝练,不仅可以借助建党记忆的建构来促进价值记忆的共享与刻写,即通过影像叙事的独特优势,使价值记忆形象化、生动化和象征化,进而帮助受众记忆这些内容,增强记忆效果,让党的价值观念不断深入内心,促进价值记忆在受众间的共享、延续和内化。同时,《觉醒年代》通过影像修辞手段对建党价值记忆进行呈现,利用其独特优势将党的价值观念即伟大建党精神隐喻化、象征化和符号化,从而在促进受众对党的政治价值认同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受众在观看电视剧的过程中,会通过剧中人物的奋斗经历以及所展现的伟大建党精神,潜移默化地完成对党的价值观念的认知和认同,为政治价值认同奠定基础。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党的价值观念逐渐内化为观众自身的价值信仰,进而从内心深处认同党的价值追求,并积极将这种认同融入自身思想体系,在情感和行动上与党紧密相连,最终实现政治价值认同的完整建构。因此,《觉醒年代》对建党记忆的影像叙事不仅是对作为伟大建党精神记忆样态的建党记忆的重塑,更是一种深刻的价值传递与认同建构的过程,对提升民众对党的政治价值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三、建党记忆影像叙事促进政治认同的进一步思考

《觉醒年代》不仅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前史”，成功构造起观众对中国共产党“因何成立、怎样成立”的集体记忆，也给同类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18](P93)}，并且“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18](P106)}。可见，集体记忆是为服务于当下特定目的而构建的。在数字化的生活成为显著特征的今天，政治记忆面临着虚无化、遗忘化和娱乐化等多重风险^[19]，因此，客观展现以建党记忆为代表的政治记忆，促进社会大众的政治认同意义重大。在图书文本日益边缘化的现状下，作为叙述历史的影像媒介，以重大革命历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更应主动承担起这一责任。既要确保史实叙述正确和传递正向价值观，也要贴近观众生活，采取适应时代的叙述方式，创作出符合民众需求的作品，增强大众的政治认同。

（一）兼顾建党记忆影像叙事中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的统一

对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来说，历史真实是其构建集体记忆的基石，只有基于准确的史实，才能构建起坚实的记忆大厦。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历史存在是第一性的，而对它的叙述是第二性的”^{[20](P156)}。然而，对历史进行百分之百的复刻既无现实可能，亦不符合影视艺术的传播规律，艺术创作的魅力正在于赋予历史以生命力和感染力，正如有学者指出：“革命历史剧将历史与影视结合起来，使革命历史变得大众化、通俗化”^[21]。《觉醒年代》在这一方面做出了重要表率，剧组不仅对历史细节做了严谨考证，还通过艺术性的还原与表达，将人们脑海中平面化、碎片化的记忆补缀为立体的场景。尤为重要是，《觉醒年代》的编剧龙平平本人就是党史专家，使得电视剧在情节安排上能精准地

把握历史与艺术间的平衡。在未来影视作品的创作中，应更加注重两者的平衡，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一方面，对历史事实进行严谨的考证与审核。创作者要深入挖掘历史档案、文献资料，邀请历史学家合作进行剧本创制，确保对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经历、社会背景等的呈现准确无误。如在描绘党的重要会议时，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人员、讨论关键议题以及决策过程等都应严格遵循史实。另一方面，注重艺术表达的合理性与创新性。在情节编排、人物刻画、场景渲染等方面要巧妙运用艺术手法对“历史空白”进行填补，使历史故事更加生动、引人入胜。对一些只记载只言片语的历史细节，可以通过合理的想象进行补充，如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等，但这些补充必须符合历史逻辑和人物性格特征，避免为追求艺术性或娱乐性而违背历史真实。比如在展现革命先辈的艰苦奋斗时，可以适当描绘他们在困境中的情感起伏、信念坚守，让观众在感同身受的同时又不失历史的庄重与严肃，以实现历史教育与艺术欣赏的双重效果。

（二）通过群像叙事拓展建党记忆的叙事视角与记忆空间

“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22](P118-119)}，《觉醒年代》通过群像叙事的方式，展现了那个时代下不同社会阶层在建党过程中的角色与贡献，从而拓展了建党记忆的叙事视角与记忆空间使得建党记忆更加立体和全面。未来的作品可以进一步扩大人物群体的涵盖面，不仅包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劳苦大众，还可以纳入更多元的社会角色。如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其中极具挖掘深度的一类群体，在当时复杂的历史环境下，民族资产阶级处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夹缝间，一方面，他们怀揣“实业救国”的理想，试图通过发展民族工商业抵御外来经济渗透、实现国家富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封建势力的束缚与列强资本的挤压中艰难周旋。他们中的一部分

人可能陷于支持革命和维护自身利益之间的艰难权衡,刻画这类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摇摆与最终走向,能够深刻地反映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错综复杂和阶级矛盾的尖锐,从另一个层面展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曲折性,进而凸显中国革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此外,海外华侨、爱国乡绅、开明地主等群体也可纳入叙事视角,避免记忆空间的阶层局限。另一方面,地域维度上应进一步加强对不同地区建党活动的深入挖掘,如长沙、广州、武汉等地的独特贡献和斗争特色,避免记忆空间的地域局限。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地构建群像叙事,从不同阶层、不同立场、不同地域的人物视角出发,可以系统地展现建党历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从而极大地丰富建党记忆的内涵意蕴,为观众提供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使建党记忆等历史记忆不局限于单一群体或局部地区,而是深深烙印于不同群体的心灵深处,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对党的历史更为强烈、广泛的政治认同,形成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合力。

(三) 借助细节刻画与情感塑造构建立体化、具象化的人物形象

正如导演张永新所说:“要用一种历史的眼光,辩证地唯物地看待和展现这些人物,不因人设事。”^[23]由于现代人是带着结果对过去的历史进行还原的,因此影视作品中对历史人物的呈现难免带有一定程度的理想化色彩。而实际上,当时的革命者内心既有对信仰的坚定执着,也有对革命前途未卜的忧虑,情感复杂多元,传统主旋律剧中人物形象的“高大全”就使得观众难以共情。《觉醒年代》则以细腻的细节刻画和真实的情感塑造,使教科书中的历史人物,回归到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行列,增加了观众的代入感和共鸣。但在如潮的好评中,冷静的批评更为宝贵,有观众认为《觉醒年代》将那个时代的人拍得过于激情甚至是亢奋,仿佛时刻有摄像机在周围记录。事实上,由于叙事重点和叙事策略的选择,《觉醒年代》确实对一些历史细节和情感冲突进行了选择

性的回避。未来的影视作品应进一步注重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变化,通过细腻的情感塑造和丰富的细节,构建出更加立体化、具象化的人物形象。除了家庭情感和社会情感的表达,还可以深入挖掘人物在面对困难、挫折、牺牲时的情感反映,展现出革命先辈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打破传统的英雄形象单一化、平面化的局限。同时,要注重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塑造。例如,陈独秀在革命事业上的坚定与果敢,以及他在家庭关系中存在的不足,如与子女沟通方式的问题等,这样的多面性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也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观众在感受到人物的复杂性和真实性后,会更加深刻地理解他们的选择和牺牲,从而将对人物的认同转化为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与认同,增强政治认同的深度和持久性。

(四) 运用影像修辞引发受众共鸣塑造建党记忆

影像其相较于话语、文字和文物等静态载体的优越性就在于影像作品能够依托人类官能,激发受众对视觉形象的想象与欣赏能力。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们还是偏爱于自身感觉,而在各种感觉中,尤其看重视觉”^{[24](P1)}。换言之,影像作品能以其独特的视觉美学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斯蒂格勒认为:“这种美学需要我们对既作为节律又作为记忆的程序作类型描述。美学的内容正是建立在这种以重复的形式构成已经在此的传统和种族的程序之上。”^{[25](P94-95)},影像修辞既是影视作品展现其视觉美学的“表现空间”,更是影视作品中传达深层意义的重要叙事手段,在未来的影视作品中应得到更为广泛深入和灵活的应用。在物象隐喻方面,可以进一步挖掘更多具有代表性的物象,赋予其更深刻的象征意义。在蒙太奇等镜头语言的运用上可以更加创新和大胆,尝试将不同时空的相似场景进行剪辑拼接,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呼应,突出党的发展历程中的传承与变革。如将早期共产党人在艰苦环境中秘密集会的场景与现代党员深入脱贫和救灾一线的场景交替呈现,

既能直观展现党从萌芽到壮大的伟大跨越,又能清晰地传递出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始终坚守的初心与使命。在色彩运用上,除了冷暖的对比,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主题采用多样化的色彩搭配进行氛围的烘托,增强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张力,使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深刻铭记建党历程中的伟大精神和历史意义,进而在观众心中塑造出更为深刻持久的建党记忆。

此外,由于视觉美学“与技术趋势和特有语言的特殊性有双重关联”^{[25](P96)}。由此,在传播渠道方面,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优势拓展建党记忆影像的传播范围就显得尤为重要。除传统的电视平台外,应将作品投放到各大视频网站、社交媒体平台上,吸引更多年轻观众的关注。针对不同平台的特点,制作多样化的宣传内容,引发观众的讨论和分享,形成良好的传播效应。同时,积极开展线下互动活动,如举办主题观影会、党史讲座与影片放映相结合等,让观众在观影后有机会深入交流和探讨,加深对建党记忆的理解和政治认同。通过线上线下的协同传播,使建党记忆影像叙事更好地发挥其政治认同建构的功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更强大的精神力量。

四、结语

影视作品是承载历史记忆的重要媒介,是联结历史和现实的桥梁。“影像史学”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海登·怀特正式提出。因此,西方国家通过历史记忆影像叙事的经验和不足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从其叙事视角来看,西方影像作品都习惯于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来构建历史,倾向于强调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导作用,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非西方世界的记忆简化和记忆遮蔽。另一方面,高度市场化的外部环境使得其在历史真实性与戏剧娱乐性之间存在失衡,与中国的文艺作品需要考虑社会效益不同,西方的影视作品是单纯服

务于经济收益的,而为了吸引观众和保证票房,其影像作品往往要进行很大篇幅的戏剧改编,混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此外,由于西方国家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其塑造的历史叙事往往能够覆盖世界,挤占甚至湮没了其他地区对自身历史的阐释权和发言权,导致了全球历史认知的不平衡。以二战中的大屠杀事件为例,同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相比,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等惨案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就不强,甚至出现否认其事实存在的言论。

《觉醒年代》以影像方式对建党记忆的呈现和建构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一方面,它借助强大的叙事能力,为重现和传播历史提供了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它既超越了西方影像叙事中难以摆脱的商业逻辑和意识形态偏见,又超越了传统主旋律影视的平淡乏味。也就是说,它以所呈现的历史记忆使观众在观看中与历史对话、与先辈共情,进而形成对政党、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的强烈认同,也为后续相关题材的影视作品提供了创作手法上的启示与借鉴。因此,应当高度重视影像这一独特的记忆媒介,不断探索创新,让这一叙事形式更好地服务于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民族力量以及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使命,使以建党记忆为代表的历史记忆和政治记忆在新时代成为激励党和人民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 [1]杨婷. 论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的红色记忆机制与实践图景[J]. 湖南社会科学, 2022(6): 15-22.
- [2]陶俊怡. 伟大建党精神传承赓续的红色记忆路径[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7): 40-46.
- [3]武豹, 吴学琴. 历史虚无主义对建党记忆的消解及其警示[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4(2): 33-41, 108.
- [4]赵爱霞, 左路平. 伟大建党精神的记忆叙事及其政治认同功能[J]. 思想理论教育, 2025(3): 77-83.
- [5][德]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有多真实[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6]左路平, 周晗, 王婷. 《觉醒年代》的多重审美维度

- 分析[J]. 现代视听, 2021(2): 23-27.
- [7]张智华. 影视文化传播[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 [8]陈伟龄. 政治记忆的影像表达——论“十七年”电影与政治记忆建构[J]. 艺术百家, 2017(5): 95-102.
- [9][美]罗森堡. 政治文化[M]. 台北: 桂冠图书有限公司, 1984.
- [10]何显明. 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诠释功能及其限制[J]. 现代哲学, 2006(1): 24-31.
- [11]王桂环. 用艺术精品宣传研究党史的一次尝试——访《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J]. 北京党史, 2021(3): 55-62.
- [12]柴宝勇. 论政党认同的含义及其要素[J]. 探索, 2009(1): 62-68.
- [13]吴玉军. 论国家认同的基本内涵[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5(1): 48-53.
- [14]佐斌, 秦向荣. 中华民族认同的心理成分和形成机制[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4): 68-76.
- [15]金寿福. 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J]. 外国语文, 2017(2): 36-40.
- [16]李琦, 闫志成. 叙事·记忆·认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的主题呈现[J]. 传媒观察, 2021(7): 26-30.
- [17]孟茹玉. 论价值认同的生成机制与教育理路[J]. 思想理论教育, 2019(5): 59-63.
- [18][法]莫里斯·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9]左路平. 政治记忆与主流意识形态认同[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12): 62-68.
- [20]周月亮, 韩骏伟. 电视剧艺术文化学[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
- [21]龙念. 革命历史影像记忆建构中的权力实践[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7(3): 150-156.
-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23]戚雪, 吕岩梅. “堂堂正正把主旋律拍好看”——专访《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EB/OL]. (2021-03-28)[2026-04-24].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5DNIITD0534HPN8.html>.
- [2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程诗和, 译.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6.
- [25][法]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M]. 赵和平, 印螺,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责任编辑 邱佛梅】

Visual Narrative and Politic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Memory of the Party's Founding: The Case of *The Age of Awakening*

ZUO Luping & ZHU Liang

Abstract: How to activate founding mem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and strengthen political identity through visual narrative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red culture dissemination and mainstream ideology construction. On the CPC's centenary, *The Age of Awakening* reconstructs the Party's founding history through historical restoration, comprehensively reproducing its historical logic and spiritual core across four dimensions—factual, character, emotional, and value memory—and serving as a model for the visual inheritance of Party founding memory. Politically, the drama significantly advances politic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factual memory enhances recognition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character memory strengthens party identity, emotional memory fosters emotional identity of political status and national belonging, and value memory achieves political value identity. The series offers valuable reference for similar creations, including balancing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and artistic creation, expanding narrative perspectives through group portraits, constructing vivid characters via detailed depiction, and employing visual rhetoric to arouse emotional resonance. Going forward, visual narrative should be further leveraged to buil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support the socialist cause.

Keywords: Party founding memory; visual narrative; political identity; *The Age of Awakening*; emotional identity